

· 学员论文选刊 ·

# 管仲军事思想浅析

张 映 魁

**摘 要** 管仲,名夷吾,字仲,春秋齐颖上人,公元前 685至前 645年,相齐达四十年,辅佐齐桓公期间,针对时尚和齐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兴利除弊,欲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的改革。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,开拓出一条富国强兵之路。他在齐国跃居五霸之魁的过程中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,同时在国家改革图盛的理论和实践诸方面均有所建树,特别是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**关键词** 管仲 军事思想

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,涉及战争观、治军思想和战略、战术原则等一系列军事问题。春秋,是军事思想日臻成熟,并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的理论认识阶段。虽然论者从不同“国家”、“集团”、阶段的利益出发,所引事实,战例不同。但异曲同工,殊途同归。管子身浮乱世,面对王室衰微,纷争四起,攻城掠地的时局,自然力图自保、雄踞一方,实现王者霸业就成了他恪守的信条。虽居齐,尊桓公,但军事思想与时代同仁略同:

第一,关于战争性质、起源和作用问题。在《七法》总论中有这样一段:

“言是而不能立,言非而不能废,有功而不能赏,有罪而不能诛,若是而能治民者,未之有也。是必立,非必废,有功必赏,有罪必诛,若是安治矣?未也。是何也?日形势器械未具,犹之不治也。形势器械具,四者备,治矣。不能治其民,而能强其兵者,未之有也。能治其民矣,而不明于为兵之数,犹之不可。不能强其兵,而能必胜敌国者,未之有也。能强其兵,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,犹之不胜地。兵不必胜敌国,而能正天下者,未之有也。兵必胜敌国也,而不明正天下之分,犹之不可。故曰:治民有器,为兵有数,胜敌国有理,正天下有分。”

上述文学表达的中心思想是:治民要有军备,用兵要有策略,战胜敌国要有道理,匡正天下要有纲领。四者之间有必然联系:治民缺乏军备的威慑,也只能流于纸上谈兵,隔靴搔痒;有军队,不知道统分、用兵的策略、方法,是属盲动而战之自败。必给人民和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,蒙受巨大耻辱;征服敌国就武力而言较为容易,要获得社会舆论支持十分艰难。因此,必须察明和认定自己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、有理的;战胜它国,表面上完成了对其领土的占据和统治,但不一定使其国民心悦诚服。所以应制定符合形势、顺应民心的治理纲领,使他们认识到现在的新政权更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。

文中指出:“能强其兵,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,犹之不胜也。”实际上已把战争的性质区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,并且强调正义者必胜,非正义者必败。正如《吕氏春秋》所言:“兵苟义,攻伐亦可,救守亦可;兵不义,攻伐不可,救守不可。”自古以来兵家都很重视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”的至理名言,同时揭示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这一普遍被认同的朴素真理。

讲到战争的起源,战国吴起概括出引起战争的五种原因,即争夺霸主地位;争夺土地、财产和人口;仇恨的积累;内乱和饥荒。春秋时齐国看到王室腐朽、政治衰败、号令不行,于是公开打起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,在周天子这块招牌掩护下南征北战,迅猛壮大自己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实力,扩充版图。终于在前 651年葵丘会盟时正式确立霸主地位。文首“四者”存(“言是而不能立,言非而不能废,有功而不能赏,有罪而不能诛。”)则民无治。势必因革故鼎新民揭竿斩木,铤而走险,战火爆发。虽管子没有把引起战争的原因具体化,但其言词与吴起大同小异。

军队,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国家机器,其职能对外御敌入侵,关系国家存亡;对内治平勘乱,保证国家和平稳定。俗语云: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。”一旦战端开,当出则为兵,以解国家燃眉之急。战国尉缭子认为,战争

的作用是镇压暴乱,制止不义行为。《司马法》中也指出“以战止战”,认为“是故杀人安人,杀之可也;攻其国爱其民,攻之可也;以战止战,虽战可也。”说明了以暴力制止暴力的积极作用。这一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。管仲在《七法》《幼官》等篇里一再指出:“明于胜敌国之理”,“明于正天下之分”,“大胜者,积众胜无非义者焉,可以为大胜。大胜无不胜也。”“……立义而加之以胜,至威而实之以德,守而后修胜,心焚海内。民之所利立之,所害除之,则民人从。立为六千里之侯,则大人从。使国君得其治,则人群从。会请命于天,地知气和,则生物从。”强调只有正义的战争,才可能取得大胜。

孙武在论述战争、政治、经济的辩证关系时,认为“兵者,国之大事,化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说明战争关乎国计民生,必须加以研究。他清楚地认识到,战争是取得政治、经济利益的手段;军事是实现政治、经济目的的工具。管子对此关系也有文学论述:

“为兵之数:存乎聚财,而财无敌;存乎论工,而工无敌;存乎制器,而器无敌;……是以欲正天下,财不盖天下,不能正天下;财盖天下,而工不盖天下,不能正天下;工盖天下,而器不盖天下,不能正天下;……。”

“……野不辟,地无吏,则无蓄积;……故早知敌则独行,有蓄积则久而不匮,……。”(选自《七法》)

“治者所道富也,治而未必富也,必知富之事,然后能富。富者所道强也,而富未必强也,必知强之数,然后能强。强者所道胜也,而强未必胜也,必知胜之理,然后能胜。胜者所道制也,而未必治也,必知制之分,然后能制。是故治国有器,富国有事,强国有数,胜敌国有理,制天下有分。”(选自《制分》)

“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,此霸王之本也,然而与危亡为邻矣。天道数,人心之变:天道之数,至则反,盛则衰;人心之变,有余则骄,骄则缓怠。夫骄者,骄诸侯;骄诸侯者,诸侯失于外;缓怠者,民乱于内。诸侯失于外,民乱于内,天道也。此危亡之时也。若夫地虽大,而不并兼,不攘夺;人虽众,不缓怠,不傲下;国虽富,不侈泰,不纵欲;兵虽强,不轻侮诸侯,动众用必为天下政理,此正天下之本霸王这主也。”(选自《重令》)

论述了军队要取得胜利,其先决条件是国家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。鉴于当时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,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高低完全取决于农业的发达与否。“三军未动而粮草先行”,就是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。因此,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大张旗鼓地,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劝民勤于农桑。

军事胜利只是表面现象,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——治天下才是关键。《制分》《重令》两篇明示君王,如果只追求政治目的,混淆战争的正义性,即使国再富,兵再强,治理天下也只能是南柯一梦。就兵胜、国富来说,其根本在于政治,“兵之胜败,本在于政。”由此观之,对经济、政治、军事三者关系的见地和前述几位一脉相承。《权修》载:“地博而国贫者,野不辟也;民众而兵弱者,民无取(趣,督促、促进)也。故未产不禁则野不辟,赏罚不信则民无取。野不辟,民无取,外不可以应敌,内不可以固守,故曰,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(实力),而求权无轻,不可得也。”这段文学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间的关系表述得就更为精辟。

第二、关于治军理论。首先,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。认为“英雄者,国之干。”“治国安家,得人也。”以及“民之司命,国安危之主也。”可见,将帅地位举足轻重。因此,对将帅的要求极严格。孙子说他们必须具备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五个条件。《三略》认为一个良将应有十二能,即能清、能静、能平、能整、能受谏、能听讼、能纳人、能采言、能知国俗、能山川、能表险阻、能制军权。《五经总要》在重申孙子所言外,还应具备理、备、果、戎、约“五谨”。可见将帅不只是一般人想象的一介勇夫,应该力求德才兼备、智勇双全,如妇孺皆知的伍子胥、孙臧、廉颇、白起等。《管子》有专门的文学论述这一点:

“故事无备,兵无主,则不早知敌;野不辟,地无吏,则无蓄积;官无常,下怨上,则器械不功;朝无政,赏罚不明,则民幸生。故早知敌则独行,有蓄积则久而不匮,器械功则伐而不费,赏罚明则民不幸生,民不幸生则勇士劝矣。故兵也者,审于地图,谋于日官,量蓄积,齐勇士,遍知天下,审御机数,兵主之事也。”(选自《七法》)

其二,管子在建、教军和练兵诸方面亦不偏废。如:

“三官在谬,五教不乱,九章著明,则危危而无害,穷穷而无难。故能致远以数,纵强以制。三官:一曰鼓,鼓所以任也,所以起也,所以进也;二曰金,金所以坚也,所以退也,所以免也;三曰旗,旗所以立



兵也,所以制兵也。所以偃兵也。此之谓三官。有三令而兵法治也。五教:一曰,教其目以形色之旗;二曰,教其身以号令之数;三曰,教其足以进退之度;四曰,教其手以长短之利;五曰,教其心以赏罚之诚。五教各习,而士负以勇矣。九章:一曰,举日章以昼行;二曰,举月章以夜行;三曰,举龙章则行水;四曰,举虎章则行林;五曰,举鸟章则行陂;六曰,举蛇章则行泽;七曰,举鹊章则行陆;八曰,举狼章则行山;九曰,举棊章则载食而驾。九章既定,而动静不过。”(选自《兵法》)

“三官”、“五教”、“九章”等都属教练的内容。“三官”,是古代两军交战各自将帅指挥作战必不可少的法宝。在当时生产力状况下,武器的优劣受到很大的制约,与古代作战的特点也有一定联系。双方兵对兵,将对将,基本上靠的还是体力消耗。如果一军之帅为些蝇头小利,不知运用“三官”随机应就,进退自如,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,就会遭致损兵折将,甚至全军覆没;或者士兵不知“三官”,纪律涣散如沙,各自为战,势必也削弱军队攻、守力量,犹如无头苍蝇,成一群乌合之众。因此,上至帅,下至兵,从理论到实践不知“三官”,将导致兵灾、国灾。

“五教”,一方面要求士兵学习有关军事理论和知识;另一方面士兵应依照指定项目训练和熟练掌握各种基本军事技能。理论和实践经济在实战中都很重要,二者如相互脱离,遇到新问题则无法论证;找到处理的最好方法,则不可能举一反三,实践上只会变成列搬硬套、纸上谈兵的赵括。

管子在文中提到在教练过程中,士兵必须充分发挥眼、耳、脑、手、足的功能,各器官协调一致,综合运用,力图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。一旦士兵能眼观旗帜、耳听号令、足走步伐、手用兵器、脑想赏罚,充满作战的勇气,胜利就在望了。

如果说“三官”、“五教”只局限于操场训练的话,那么“九章”讲的就是地形、地貌复杂的野外训练。打战不是可以随意固定战场的,要根据敌军和我军的情况,趋利避害,选择有利地势歼灭敌人。因此,适应各种情况下的作战更能体现军队素质,可谓上兵、锐兵。况且作战全非书本上的理想模式,须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异。军队只有适应各种突发事变,处于特殊条件(如围地、绝地、兵力悬殊等)下才不怨天尤人、坐以待毙,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。针对敌军薄弱环节克敌制胜、转危为安,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正若管子说:“器成教施,追亡逐遁若飘风,击刺若闪电。”

管子认为:“三官”、“五教”、“九章”是军队参战取胜的必要保证:“动慎十号,明审九章,饰习十器,善习五教,谨修三官。主必常设,计必先定。求天下之精材,论百工之锐器,器成角度否絨。收天下之豪杰,有天下之称材,说行若风雨,发如雷电”(《幼官图》)。强调一方面部队要研习兵法;另一方面又要据其内容而实际操练。二者必须双管齐下。文中除此意之外,还透露出军队建设上力求招集良才,配给较好的武器装备,即“求天下之精才”、“收天下之豪杰”(称材)、“论百工之锐器,器成角试否絨。”

管子的建军思想是富国强兵、寓兵于农。因为寓兵于农可以减轻人民负担,不夺农村,又能给养自足。这样就能国内安定、秩序井然,打起战才能不忧后勤,受到广泛支持。

管子也较为重视军队管理,重视军民关系,他说:“畜之以道,养之以德。畜之以道则民和,养之以德则民合。和合故能习,习故能偕,偕习以悉,莫能伤也。”民的地位是不可轻视的,它是军队取胜的一个重要支柱。缺乏后方援助,前方就会一败涂地。就是暂时胜利,也不会稳固。

关于军队建制,管子认为:

作内政而寓军令焉。为高子之里,为国子之里,为公里,三分齐国,以为三军。择其贤民,使为里君。乡有行伍,卒长其制令,且以田猎,因以赏罚,则面姓通于军事矣。桓公曰:善。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,轨为之长。十轨为里,里有司。四里为连。连为之长。十连为乡,乡有良人。以为军令。是故五家为轨,五人为伍,轨长率之。十轨为里,故五十人为小戎,里有司率之。四里为连,故二百人为卒,连长率之,十连为乡,故二千人为旅,乡良人率之。五乡一帅,故万人一军,五乡之帅率之。三军故有中军之鼓,有高子鼓,有国子之鼓。春以田,曰 ,振旅。秋以田,曰 ,治兵。是故率伍政,定于里。军旅政,定于效。”(《小匡》)

从《小匡》这段文字了解到,当时齐设三军,常备兵力共三万人。军下设五乡,乡下设十连,连下设四里,里下设十轨,最小的军事单位是家。三军以鼓相分,不尽相同,不同级别,处理政事的地点也有专门规定,“卒伍政,定于里,军旅政,定于郊。”三军春、秋两季操演,春训练回兵,秋训练出兵。从文字叙述可知,当时军种已分陆军和水军(九章中已有描述)。当然它们也不是分得特别森严。因此,谈及其兵种就只限于“车兵”和“步兵”



(包括有骑兵和水兵)

第三,关于战略、战术问题。这是古代军事家所讲的兵法。战略,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。战术,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。在《管子》某些篇目中涉及的战略、战术内容,管子也有专门的文学论述:

“若夫曲制时举,不失天时,毋圯地利。其数多少,其要必出于计。故凡攻伐之为道也,计必先定于内,然兵出乎境。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,是则战之自败,攻之自毁也。是故张军而不能战,围邑而不能攻,得地而不能实,三者见一焉,则可破毁也。故不能明于敌人之阵,不能加也;不明于敌人之情,不可约也;不明于敌人之将,不先军也;不明于敌人之士,不先阵也。是故以众击寡,以治击乱,以富击贫,以能击不能,以教卒,练士击驱众、白徒,故十战十胜,百战百胜。”(《七法》)

管子认为,要达到“是故以从击寡,以治击乱,以富击贫,以能击不能,以教卒、练士击驱众、白徒,故十战十胜,百战百胜。”的战争效果,最为根本的是兵未出境,计必先定于国内。计,这里指的是经过考察敌军情况,统筹制定的战略计划。它对三军的行动起着宏观指导作用。军队开出国境而没有战略计划,不必说战争的结果一定是失败,进行攻战也是自己将自己毁灭。摆开阵势还没有确定打仗,包围城邑还不能确定攻取,得了土地还不能确定据守,三种情况中只要有一种,就会被毁灭。所以,了解、掌握敌人的政治、军情,将领、士兵,制定军事战略计划显得异常重要。有了计划就不会打、攻、守而不知其去向,就不会因犹豫而耽误了战争时机,招之失败自毁的惨局。居高临下而鸟瞰战争。纵观全局而把握时机,不失天时、地利则可以有的放矢。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先具备战略计划的基础上。

战略思想是实现战争目的统率思想,战术却是实现战略思想的手段和关键。管子在《七法》中讲的“以众击寡,以富击贫,以能击不能,以教卒、练士击驱众、白徒、故十战十胜,百战百胜。”实际上这也就是战术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。他以深邃的目光,发现集中兵力,扬其优势,克服自己短处战胜敌人的重要性。管子承认战争中存在许多矛盾,潜意识地告诉我们,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。所以,暗示军中指挥人员应变不利为有利,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敌人众、富、强、治,可以使之寡、贫、弱、乱,然后以有利击不利。管子在《幼官》里说:“必明其情,必明其将,必明其敌,必明其士。四者备,则以治击乱,以成击败。”“四备”就是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,“以治击乱,以成击败”讲的是结果。这段文字实质上就是对《七法》叙述的一个照应。

为了避免间谍刺探到真实军情,提出实、虚、动、静相结合的原则,扰乱敌人视听,使其进入我军预先设计好的圈套而一举取胜。他说:“始乎无端,卒乎无穷。始乎无端,道也;卒乎无穷,德也。道不可量,德不可数。不可量,则众不能图;不可数,则为诈不敢乡。两者备施,动静有功。”(《幼官》)就是说,战争的起止好比“道”、“德”。“道”不可量度,“德”不可以测算。只要做到虚实结合,敌人就无法图谋和对抗我军。无论动兵或息兵,都会取得有效的结果。在《兵法》篇中他说:“善者之为兵也,使敌若据虚,若搏景(影)。无设无形焉,无不可以成也;无形无为焉,无不可以化也。此之谓道类。若亡而存,若后而先,威不足以命之。”其大意是,善于用兵,就要使敌人弄不清自己的虚实,似乎只能同影子搏斗。我军表面无形、无设(方位)、无为,假亡真存,似后实前的变化无端,实际上是以假乱真引诱敌人。先造成视听错觉,在错误判断下作出错误的军事布署,然后有利我军,最终歼灭敌人。

管子还提出出兵神速,先发制人的战术。他说的“举兵如飞鸟,动之如雷电,发之如风雨。”,“速用兵则可以必胜”。说明奇兵可争取时间,占领军事要地,打乱敌军计划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瓮中捉鳖,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。同时,以逸待劳,派间谍内外响应等原则,在其言谈中也有论述。

管子生活于群雄并起,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,无论哪国有一支正规的强兵劲旅,都将首先成为取得霸主地位的政治资本。管子的军事思想,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,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。虽然管子受忠君思想限制,但力求富国强兵的贤明改革,使齐兵勇将猛,为称霸天下打下坚实基础。管子军事思想在频繁战争中受到不断检验,内容更加丰富,体系更加完备。

管子军事思想虽没有另立门户,以专著形式出现,但分篇论述至少也是一种萌芽。及至春秋末年,吴国军事家孙武才吸取前人经验,结合实践,撰定成誉满海外,流传异域的世界级军事巨著——《孙子兵法》。第一次将军事思想分门别类地加以论述,方便了后来者参对和阅读。他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思想,概括兵法为度、量、数、称、胜,以及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,兴正义之师讨伐不义行为,集中优势兵力打败敌人等。管子对此早已论及。管子的军事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,值得认真研究。

责任编辑 彭多毅